

基于语料库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三译本对比研究

张威,朱娜葳,孙泽瑞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基于自建的语料库,从源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翻译特征3个角度探讨巫宁坤、李继宏、张思婷3位译者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的风格差异。研究发现:巫译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译文中的晦涩表达较多;李译采用长篇导读和详尽注释,目标语读者关照程度最高,有利于中文读者理解译文;张译女性主义翻译特征最明显,脏话的委婉处理次数最多。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语料库翻译学;翻译风格;女性主义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其三译本

出版于1925年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是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巅峰之作,奠定了他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部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和长岛为背景,细致刻画了美国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并围绕“美国梦”这一主题展开记录、描写和分析,揭示了“荒原时代”的内涵。

笔者选取巫宁坤、李继宏、张思婷3位译者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汉译本作为研究对象。1980年,《世界文学》杂志邀请巫宁坤翻译此书,巫译本是中国大陆的首译版本。2013年,《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丛书出版,其中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同年,张译本由漫游者文化出版。

二、三译本的比较分析

基于自建的语料库,以3位译者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汉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源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主义翻译特征3个角度作为考察译者风格的切入点,分析这3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1. 源语透过效应的比较分析

翻译中的语言干涉,准确地说就是“源语透过效应”。文学作品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其过程中必然有源语透过效应的产生,主要原因有三: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遵循语言的发展规律;翻译过程中必然发生语言接触^[1]。

源语透过效应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单位,而句子则是语言中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单位^[2]。在词汇层面,本研究关注助词

“的”、数量词“一个”“一种”是否滥用;而在句法层面,可以通过句长、句段长来判定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的程度。

首先,通过统计文本中标点符号的数量,包括句号、问号、感叹号、冒号、逗号、分号,计算出句子数和句段数,并根据总词数计算出

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以此作为判断三译本源语透过效应的标准之一^[3](见表 1)。张译本的句子数和句段数最多,平均句长、句段长最短,句法简单,可读性强,易于理解;李译本次之;而巫译本平均句长大于其他两个译本。

表 1 三译本句法总体特征

三译本	总词数/词	句子数/个	平均句长/词	句段数/个	平均句段长/词
巫译本	7 757	3 203	16. 84	7 360	7. 33
李译本	7 634	3 199	15. 92	7 698	6. 62
张译本	8 686	3 583	13. 87	8 614	5. 77

从理论上来说,英语的定语规则比汉语复杂且繁多,定语可以放在被修饰中心语的左边或者右边。而在汉语体系中,定语只能放在被修饰中心语的左边^[4]。因此,汉译本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超长修饰语的句子,其中必不可少地要使用助词“的”,使句子变长。在古代汉语体系中,文言文中存在极少数包含结构助词“的”的词语或句子。在英译汉作品中,虽然“的”字不可或缺,但是使用频率过高,造成“的的不休”的句式也常常被人诟病^[5]。因此,结构助词“的”的使用频率可以作为判断译文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程度的指标。

利用 AntConc 软件统计三译本中结构助词“的”的词频,巫译本中出现了 3 330 次,李译本中出现了 2 951 次,张译本中出现了 2 459 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料库显示,平均一句话中有 4 个及以上的“的”,这可以作为衡量一句话滥用“的”的标准。为了更加精准地进行搜索,利用 Python 语言编码筛选一个句子里包含 4 个及以上“的”字的频数(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巫译本中结构助词“的”出现的数量均高于其他两种译本。结构助词“的”过多出现在汉语译本中虽然还原了源语语言结构,但会导致译文不够清晰,臃肿累赘,不利于读者理解。

译例 1:

原文:After all, in the very casualness of Gatsby's party there were romantic possibilities totally absent from her world.

巫译本:话说回来,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6 个“的”)

李译本:终归到底,盖茨比的宴会虽然不讲繁文缛节,却有着罗曼蒂克的可能性,而这在她的世界里是完全没有的。(4 个“的”)

张译本:毕竟,在盖府随性氛围中酝酿的种种浪漫,从来不曾出现在她的世界。(2 个“的”)

译例 1 中,巫译本出现了 6 个“的”,大都表示修饰关系,置于名词之前,使句子冗长。在这短短一句对晚会的描写中,巫译本选择 3 个带有“的”的前置定语共同修饰名词“气氛”,另外 3 个带“的”的前置定语共同修饰名词“可能性”,明显受到了源语的影响,语句生硬。李译本和张译本有意避免过多使用助词“的”,并适当调整语序。从这个角度看,巫译本受到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

在英汉翻译过程中,汉语“一个”“一种”常常对应英语不定冠词不确指的翻译,而删除这些不必要的数量词对译文并没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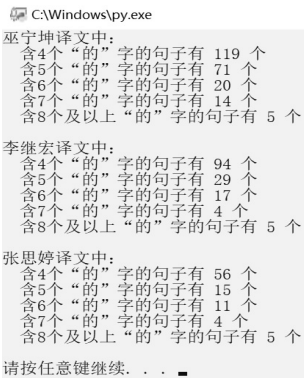


图 1 三译本中含 4 个及以上“的”字的句子数

因此,这两个数量词的使用可作为判断译文受到了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的标准之一^[6]。

利用 AntConc 软件进行检索,巫译本中出现“一个”281次,“一种”59次;李译本中出现“一个”85次,“一种”19次;张译本中出现“一个”78次,“一种”仅5次。巫译本使用这两个数量词的次数明显高于李译本和张译本,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巫译本受到英语源语的影响,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翻译腔。

译例2:

原文:…but there was an excitement in her voice that men who had cared for her found difficult to forget:a singing compulsion, a whispered “Listen,” a promise that she had done gay,exciting things just a while since…

巫译本:……但是她声音中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

李译本:……但最让人兴奋的还是她的声音,足以令在乎她的人永生难忘:那是低吟浅唱,也是窃窃私语,暗示着她刚刚做完欢乐轻快的事……

张译本:……最难忘的还是她说话时掩不住的兴奋,仿佛说着说着就要唱起歌来。“嘿”,像这样附在你耳边,说着她做了哪些好玩的事……

译例2中,巫译本选择对英语中的不定冠词一一进行对应翻译,还原源语句式结构,使汉语译文晦涩生硬。李译本和张译本对这样不必要的数量词则进行了省译,使句式更加简洁。

综上所述,巫译本的平均句长最长,助词“的”和数量词“一个”“一种”的使用频率最高,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强。这是因为巫译本出版之时,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刚刚复苏,更加注重忠实于原文,而李译本和张译本出版于21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要求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求做到忠实于原文,

还更加注重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李译本和张译本有意识地避免源语对译文的影响,因而二者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相对较小。

2. 目标语读者关照的比较分析

接受美学是文学批评理论之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强调读者及其阅读接受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7]。接受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认为翻译活动不只是原作者和译者两者之间的互动,译文读者也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主体。读者对于翻译文本的阅读与接受与否是判断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两大要素,因此,译者对目标语读者的关照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由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是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8],包括封面、标题、序跋、致谢、注释、插图等。通过研究译文中的序跋和注释两种副文本,考察3个译本的目标语读者关照状况。

巫译本于1996年和2004年再版时增添了《译后记》和《译序》各1篇。6页《译后记》简要地记述了巫宁坤从美国回国任教将该书带回中国、应《世界文学》月刊之邀翻译此书的过程,以及后来偶遇菲茨杰拉德之墓的感触;8页《译序》介绍了该书的背景、情节、主题及意义。李译本中为读者提供了长达20页的详尽导读,首先详细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一创作背景,包括爵士乐、汽车产业、妇女选举权、禁酒令等,其次介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命名、销量、荣誉等,最后从3个方面分析了该书的艺术成就,包括时代氛围的再现、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对美国梦的审视等。而张译本中则没有添加序跋。

巫译本中共有61处简短的脚注,平均每处19.28字。李译本的注释详实,统一附在

文后,共计 13 页、103 处,平均每处 64.72 字,部分参照了美国 Penguin Classics 出版公司出版的 2008 年版本 Tony Tanner 的注释,均已注明来源。而张译本仅有 6 处脚注,这是因为当时与其出版时间接近的汪芃译本使用了不少译注,张译本的出版社漫游者文化的编辑要求她设法把自己的注解融入译文。

巫译本采用较为简短的序言、后记和注释帮助读者接受译文。李译本采用长篇导读和详尽注释两种手段实现细致入微的读者关照。张译本并未使用上述副文本手段关照读者,但将注释融入译文以便于读者理解。

3. 女性主义翻译特征的比较分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翻译学者开始尝试研究女性与翻译的关系^[9]。其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发掘译文和原著中所隐藏的性别歧视,强调女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女性译者常使用色彩词、语气词和强势语,尽可能地避免使用粗俗禁忌语,较多地使用委婉语^[10]。译者巫、李二人为男性译者,张为女性译者。笔者从感叹句和疑问句的使用以及脏话委婉处理的角度来探讨 3 个译本的性别差异。

首先,统计三译本的感叹号数和问号数(见表 2)。张译本全文共 419 个疑问句,远高于李译本和巫译本。女性译者更倾向于在陈述语句中使用疑问语气。在感叹句的使用上,女性译者往往更能体察主人公的情感,擅长使用感叹词或者感叹句来充分表达主人公的情绪,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数据表明,张译本使用感叹句的频数高于其他两位男性译者。

表 2 三译本的问号和感叹号数量 个		
三译本	问号	感叹号
巫译本	327	112
李译本	340	110
张译本	419	128

其次,译文中脏话的处理方式大多数是“降格”处理,将“人”降为“非人”。译者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脏话处理呈现出浓郁的性别意识指向。部分男性译者的脏话处理更加直白。而女性译者则倾向于在不影响原文语境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文雅化处理。笔者从性别与语言差异的角度出发,对比三译本对“bitch”“hell”“damn”等 16 处脏话的处理(见表 3)。

表 3 三译本的脏话处理方式 处		
三译本	对应	弱化
巫译本	7	9
李译本	9	6
张译本	5	11

由表 3 可知,张译本对脏话弱化处理的次数最多,在保留原文脏话所表达情感的基础上,语言较为文雅。巫译本次之。李译本则更偏向于保留原文的脏话,将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

译例 3:
原文:“The poor son-of-a-bitch,” he said.

巫译本:“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李译本:“这婊子养的真可怜,”他说。
张译本:“这狗崽子,死得可怜啊。”

译例 3 中,“bitch”是指女性性关系混乱的脏话,在汉语中相对应的女性贬降词是“婊子”。巫译本没有采用这一汉语对应词,将其转换成其他脏话,弱化了对女性的侮辱。李译本使用直译的方法,没有进行任何委婉处理。张译本则将指人的“bitch”降格为动物,显示出对女性的尊重。

综上所述,张思婷作为女性译者,其译本体现出女性主义翻译色彩,具体表现为凸显文本中的感叹和疑问语气,以及面对女性贬降词时的委婉化处理。

三、结 语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经典作品曾被多次复译,为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新的力量,也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素材。笔者基于自建的语料库进行研究,从源语透过效应、目标语读者关照、女性主义翻译特征 3 个角度对比考察三译本的风格差异。研究发现:三译本体现出不同的译者风格特征,与其出版时间、背景环境有着密切相关。在源语透过效应方面,以平均句长、

助词“的”、数量词“一个”“一种”作为考察标准,发现巫译本受源语透过效应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平均句长最长,使用助词“的”的频率最高,且高频使用数量词“一个”“一种”,语言欧化倾向较为明显。在目标语读者关照方面,通过序跋和注释两种副文本的考察,发现巫译本采用较为简短的序言、后记和注释,李译本采用长篇导读和详尽注释,张译本并未使用上述副文本手段,但将注释融入译文以便于读者理解。从女性主义翻译特征角度出发考察翻译处理方式,发现张思婷作为女性译者,对原文进行文雅化处理最多。其次是巫宁坤,处理策略相对保守。而李继宏的翻译策略则是直接客观地再现原文。

参考文献:

- [1] 张威.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的定量对比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2] 林昊,冯洋,何森.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两

种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4):211-216.

- [3] 胡开宝.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 [4] 秦洪武,王克非. 英汉比较与翻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5] 李颖玉. 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 [6] 张威,孙泽瑞. 基于语料库的《李尔王》三译本欧化现象比较研究[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06-110.
- [7]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8] 肖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2011(4):17-21.
- [9]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 [10] 郑赛芬. 基于语料库的女性翻译语言研究:以王熙凤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reat Gatsby*

ZHANG Wei, ZHU Nawei, SUN Zeru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reat Gatsby* by Li Jihong, Wu Ningkun, and Zhang Sit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source language shining-through effect, concern for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nd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Wu Ningkun's translation has been mostly affected by source language shining-through effect and many obscure expressions; Li Jihong's translation adopts detailed reading guidance and annot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concern for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which is conducive for Chines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text; Zhang Siting's translatio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especially in her euphemistic translation of taboo words.

Key words: *The Great Gatsby*; 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yl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